

嵌入与反思：企业下乡与村庄农户的主体性

何朝银 施静一¹

（福州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工商资本下乡是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途径之一。通过对江西省石镇三个村下乡企业的调查发现，下乡企业的程序合法到实质合法需要持续不断的关系嵌入，土地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相互冲突又制约着企业的空间嵌入，关系和空间两者的张力使得下乡资本在文化意义上脱嵌；其中，租佃农户完成了技术嵌入的生产社会化，构成农业生产知识结构中的反思性力量；大棚雇工则在习得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中调整原有的生活，重新建构对家庭生活的认知。

【关键词】：资本下乡 嵌入性 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1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随着全球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必然会推动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开始农田基本建设工程，通过推动农业机械化、改良农作物品种等方式稳定农业产出，节省农村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之中。改革开放后，土地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给各家各户，并促进传统农业进一步向现代农业转型。近些年来，外界资本进入乡村的同时，村庄原有的经济组织形态也发生变化，不同的农村经济组织通过土地流转开展产业的规模经营活动，农业生产格局也从小农农业生产体系向新型规模农业生产体系转变(陈航英，2018)。由此，新型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存续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农户的现代转型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劳动分工有关，市场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非农的商品生产之中。从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来看，只有小纯农户、农业兼业户和非农兼业户才能被纳入现有的小农户范畴之内(陈航英，2019)；成长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退出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户家庭已经不属于“小农户”的范畴(吴重庆，2019)，其中农业兼业户被认为是“中坚农民”(贺雪峰，2015)的基础，他们以家庭劳动力的完全参与来获得与“半工半耕”大体相当的农业收入(贺雪峰、印子，2015)。然而，无论是农业的特殊性，还是农民家庭经营的特殊性、农业规模化似乎并未排挤小农户，而是出现小农户与资本共存于一个产业分工体系内，处于形式平等实力悬殊的状态(陈义媛，2016；张慧鹏，2019)。

从新型规模农业经营主体一方来看，工商资本下乡是农业产业规模扩大的重要途径之一，城市资本过剩和农村空心化的并行促使诸多学者对资本下乡在村庄的适应性进行了探讨。有学者认为，资本下乡源于政府主导、地方竞争的土地城镇化过程(周飞舟、王绍琛，2015；周飞舟，2018)，公司替代村庄改变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以及村庄的治理结构，形成村庄的“公司化”运作(焦长权、周飞舟，2016)；在“隐性农业革命下”，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型农业产业使得企业运作中排斥小规模家庭经营，但又同时形成家庭为单位的用工体制(陈航英，2020)；事实上，与南美州和大洋洲地区的大规模农业不同的是，农地经营的规模在于农村的社会形态(陈锡文，2012)，即乡土社会的关系结构。这意味着，尽管农业产业特殊性带来的经营管理问题可以通过

¹作者简介：何朝银(1974-)，男，福建福州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施静一(1998-)，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权分置’下乡治理的挑战与对策研究”[18BSH074]阶段性成果

村庄内部资源得到缓解(徐宗阳, 2016; 陈义媛, 2019), 但是工商资本的“外来性”才是无法克服的难题(徐宗阳, 2016); 此外, 下乡企业对村庄传统农业产业的作物结构(熊春文、桑坤, 2020)、村庄社区的生态基底(陈航英, 2019)的影响导向了村庄治理与发展难题, 而从关系伦理上, 产业承包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影响着具体的农业生产经营(徐宗阳, 2019)。

无论是现代农业转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户与市场关系, 还是有关乡村扶贫效果、新型经营主体的讨论, 各个学者都注意到了企业下乡后村庄乡土性和农民主体性之间的关系。然而, 过度关注资本下乡的动机或效率问题将会忽视与企业相连的农民群体对下乡资本企业的反思与行动。因此,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 资本下乡过程中, 企业如何与村庄村民发生关系, 而作为村庄主体的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随之发生了何种变化?

2 研究对象与调查地点

2020年10月, 笔者来到江西省东南部石镇新村、坊村和盛村三所村庄进行田野调查, 新村东连坊村、坊村北毗盛村, 村民均以陈姓为主, 同属客家民系, 村内居民的祖先大多是从中原南迁的客籍人, 有着相似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特征, 三所村庄的传统农业作物结构均以烟叶、白莲和水稻为主。

由于农民大量外出打工, 土地抛荒现象显著, 政府开始推动乡村农业走现代化规模经营的发展道路, 三所村庄被规划为蔬菜生产基地, 由镇政府引入惠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土地进行大棚建设。从2016年开始, 三所村庄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后, 以每667m²土地500元的租金标准将土地流转给惠民公司, 建设高标准蔬菜基地。其中, 新村最先开始大棚建设, 流转了村内土地56.67hm², 随后盛村流转了43.33hm²土地、坊村流转了15.33hm²。从规划上看, 惠民公司致力于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方式打造高产高效的蔬菜种植示范基地、休闲农业观光基地、特色精准扶贫基地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时至笔者进村调研, 三所村庄计划的土地流转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三村基地净地面积共133.33hm², 搭好的大棚面积共106.67hm²。

尽管在资本下乡过程中, 镇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本文不对政府行为做过多的讨论, 而是聚焦于村庄中下乡企业的嵌入与村民之间的关联, 以及农户对自身生产生活的反思。本文的案例与产业情况来自于惠民企业及新村、坊村、盛村三所村庄, 资料均来源于调研中的访谈记录和村级报告; 根据学术惯例, 文中涉及的所有地名、人名、政府名、组织名均作化名处理。

3 多重嵌入: 外来企业的适与不适

3.1 关系嵌入与空间嵌入: “从理想到现实”

惠民基地有两个负责人, 其中之一王华常年在村庄内居住。两人是亲戚关系, 都有在当地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工作的经历, 再加上退休前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和资金, 2017年惠民企业由镇政府引入三所村庄, 根据村委会干部的说法: “全市八个基地, 这边是蔬菜种植比较成功的一个, 闲置比例很少”。基于业缘关系, 王华从程序上顺利地镇政府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以500元/667m²的租金在新村流转60.67hm²土地, 开始搭建大棚, 土地流转后, 涉及土地的政策性补贴归村委会所有。

尽管政府已经事先做好纸上规划, 但真正让村民意识到土地的经营权流转给了“他人”, 是在村庄里的大棚开始陆续搭建之时, 惠民蔬菜有限公司开始在物理空间意义上改变村庄的面貌和格局。蔬菜大棚种植技术常常在我国北方地区应用, 其特点是在天气转冷时可以种植反季的蔬菜, 对于南方夏季较长的地区很少使用, 惠民基地的棚是可以升温的暖棚, 到了六七月份, 棚内温度可以达到七八十度。大棚建设需要平整的土地, 按照棚的规格定位方向, 在地势开阔、非风口方向按照设计好的大棚尺寸确定四角打下定位桩。为了保证棚内供暖, 通常需要选用热镀锌管沿大棚定位线插入孔中, 按照统一高度弯成弧形并联结起来, 在拱架顶部绑上纵向拉杆, 使拱架得以固定, 之后在两端拱架下插入支柱, 与棚架绑在一起形成棚头, 最后固定大棚裙膜和顶膜。

搭棚需要很强的专业性，王华刚开始搭建大棚时请了专业的技术团队指导，起初边学边搭，大棚价格极高且建设大棚的材料有明确的标准，但是像螺丝螺帽这种数量多且小的材料很容易遭到“薅羊毛”。如果说进入乡村第一步是企业基于业缘、地缘关系与县政府达成目标共识、与镇政府签订书面契约，那么进一步获得当地村民的认可和接纳就是惠民企业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王华请的搭棚的安装工都是临时工，临时工偶尔通过倒卖零件获得额外的收入，当王华意识到零件倒卖问题时很快就采取了两种办法：找包工头，和建筑材料的居民“打招呼”。

如果说管事的工头和建筑工有着直接利益关系，那么和建筑材料村民“打招呼”则有着社会资源动员的意味。为了和村庄内部发生联系，王华常常在当地进购材料，彼此进行经济交易的同时，信任关系也随之建立。与经济价值不同，信任是由于社会成员的频繁交往而形成的社会价值，这意味着当双方都因维持这种信任关系形成互惠时，处于二者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人也会受其影响。

“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用人工下车，下一次就是几千块……辛苦是辛苦的，但是也是有回报，如果用机子下的话，有的可以便宜到三四百元一次，我就觉得算了，让他们赚一点”（WH10171932）

与当地居民建立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下乡企业消除外来性，更好地嵌入于乡村社会关系网中，与村庄居民结成紧密的关系群体，形成新的关系秩序，通过长期维持的互惠关系来消除村民的陌生和疏离。

陆续在三村搭棚后，惠民基地还有超过 26.67hm² 未搭建大棚的土地，对于仍然在村居住的居民来说，大棚的进入相应的是耕地面积的减少：大棚的搭建需要很多额外的条件，比如平整土地、宽阔的道路、不会过干过涝的土壤等，这些条件无一不是藉技术改造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同时是每个村民所熟悉的生活环境。

“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是挖掘机挖平，原来是每个人分开了算，现在是全部磨平……确权统计了多少公顷，只能说统计的数额，哪里还有那么多地了，就是为了大棚方便么，全部修路修掉了”（盛村村民 10221024）

土地虽然以集体为由流转给惠民基地，但每个农户家庭都有土地确权，当分块的土地上建起了整齐划一的大棚，土地承包权所具有的个人性质使农户对棚、未搭棚的土地、棚边道路，产生了物理空间意义上的疑虑和排斥。如此，集体性和个人性之间的张力便具象化为村民对棚边土地与荒棚的议论。对于普通村民来说，土地所具有的价值不是规模化生产的向外售卖，而更多是家庭的日常内需。大棚的建立空间上进入了村域，也就嵌入在村庄自然环境和村民的生活环境。平整的土地大多用于大棚建设，而不平整、偏远的土地未流转出去，留于村民耕种。大棚的搭建是按照固定的尺寸进行规划，也就有空闲的土地未被规划在棚内，通常分布在棚边或棚与道路的小段间隔处：

“可能这里有个角，不能搭棚，老百姓就给你种啊种，你又要挖沟，他也不管你，你要挖沟他又不高兴，现在也是这样，一直没解决”（WH10171932）

在惠民基地与村委签订的合同中，惠民基地的权利是“在受让的土地上，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理产品”，相应的义务是“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照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土地流转费、对流转土地不再擅自改变农业用途，不得使其荒芜，对受让的土地进行有效保护，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如果在土地问题上发生纠纷，则需要村委会出面调解。村干部回应土地边缘种地的现象：

“人家这个棚头有点荒地，老百姓就挖，挖了就种，老板就有意见啊，说老百姓种的东西，鸡要过，人也要过，茄子、辣椒，其他种物，病虫害会进我的棚子。但是老百姓他是很实在的，他看你在那里荒，他闲不住这个。”（新村支书 10190925）

惠民公司搭建大棚后的确改变了村庄内原有的自然环境，原先国道边的荷花和露天农田都变成了水库、道路和一排排整齐的暖棚。大多愿意流转土地的村民家中的青壮年已外出打工，土地不再是收入的唯一来源，但是对于留在村里的老人来说，种地仍然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老一代村民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似乎大棚只是形式上镶嵌于三个村庄中，实质上却悬于土地之上：大棚内的土地没有被高效地使用、形式上的空间嵌入又挤占着村民生活的物理空间，使得棚外“种菜”迄今未能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小规模土地和大规模生产不仅在种植技术上有较大区别，种植季节也有差异：当棚外村民打杀虫剂时，虫子飞进棚里，而棚内还未开始杀虫时，整个棚内将受到大片的感染。每年蔬菜大棚都需要在定植前消毒杀菌：先撤去棚膜将棚内清理干净，撒上粪肥和复合肥，然后盖上棚膜用拖拉机翻地、铺滴灌管浇透水，之后关掉所有封口，创造高温高湿的环境以通过高温闷棚杀死土壤中的病菌。

从经济效益来看，大规模的农业种植极具风险。农作物生长的气候需求与季节性特点会使农业种植所需要使用的雇工、土地、农业机械设备等出现一定的闲置期，尽管现代技术手段缓解了农业产业特殊性带来的产量问题，但是如惠民公司2019年蔬菜基地生产种植计划安排所示：6-7月棚内实行高温闷棚杀菌，期间整地起垄、培育种苗并整理基地；8-12月边整地起垄边种植黄瓜、茄子、辣椒、瓠瓜、花菜等蔬菜，期间采收农作物并进行销售；1-2月继续种植并田间管理；3-4月停止种植，主要进行田间种植和采收工作。尽管大棚可以通过控温、采光等功能使农作物在不适宜生长的季节开花结果、增加产量，但是也同样会带来霜霉病、土壤带毒等。除此之外，市场上蔬菜的价格波动、气候导致的产量波动也在企业考虑之内。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棚都可以在每月得到“充分”的利用。

大棚蔬菜能否顺利产出也和传统作物结构的种植条件有关。新村、坊村和盛村传统均是以种植烟草、莲子和水稻为主，这和当地优质的土壤、气候环境有关。烟草作为经济作物适合大规模种植，需要土壤中有大量营养元素（如氮、磷、钾）；莲子则以黏性土壤为宜，需要水源和阳光充足，且排水条件良好，两种作物都因为对土壤要求较高，需要和其他作物（如水稻）轮换种植，保证土壤肥力。但是这样优质的自然资源有时并不适合大棚蔬菜的种植，会使得大棚荒棚或者产量较低：

“你们上次去的地方，搭好棚，拖拉机下去是陷在水坑里面，后面大的拖拉机一点一点吊出来，但是6、7月没水了之后，又像石头一样，我打好了地，那个时候种了茄子，但是没水啊，没有（种）地又会长草，很潮湿的时候茄子又种不了，要不就泡死，要不就旱死……因为是实际情况，原来是（种了水沟）种莲子的……”（WH10171521）

3.2 道德脱嵌：互惠与边界

惠民基地在社会经济上的关系嵌入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嵌入建立了互惠的信任基础和大棚的土地边界，两者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一方面，王华住在大棚周边以便于每天查看棚内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新、盛、坊三村距离很近，因此会有村民跨村务工的情况，大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户家庭的生产方式有很大不同，前者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决策有一定距离，具体的耕作过程被分割成不同的环节，通过简单的培训使工人尽可能在短期内胜任工作。

为了更好地建设基地任务，王华每天亲自检查三个村庄生产、管工状况，如果有农业企业合作或市场销售商来基地合作，则在大棚边的板房处商量。

“其实边做事边说话我不会干扰，你只要不大声喧哗，不要影响工作，谁会管这些。但是你这样子多难看，别人路过都会说，你走了（棚子里）就像开大会，有些事情会在这里解决啊，我会在这里说，我不可能一天到晚就盯着。”（WH10201854）

很容易看出基地在管工上是要“面子”的，面子不是来自内部的约束，而是因“外人”出现而产生，所谓的“外人”是指在村庄之外的人。从村民的视角来看，雇工村民和企业的联系是藉由工资建立起的经济联系，村庄村民的道德认知往往来自于

伦理人情，而人情有着无数的个人差异(翟学伟，2004)，大棚的规模生产工作无法建立在人情之上，而大棚基地对村民来说也是“外来”，“外来性”不仅来自于短期的租赁合同、土地的空间占用，还来源于与村庄居民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即在大棚务工和不在大棚务工的居民之间的区隔，这样的区隔常见于村民对“在大棚工作”的流言蜚语中：

“据他们说，他们是比较严格的……如果偷懒的话他就不要你了……每天要做九个小时，如果少就会扣她的工资。太严了。老人不要，就要年轻的，60 岁以上就不要了”(坊村村民 10201023)

实际上，大棚雇工通常在 8 小时左右，可以根据工种加班，工资一天 80 到 100 元，工作时间随着天气变化早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不统一，例如到了秋季，天黑较晚则上午六点半上班、十一点下班，下午两点上班、五点半下班。在大棚工作的村民并不是一进入就能适应这样的生活作息，例如村民在说到家里有事时临时回家还需要“请假”，这对于日常种田的村庄居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4 缝隙与时间：农户的劳动与生活

4.1 租棚农：技术嵌入与反思

随着种田成本的日渐增高，种田逐渐变成村庄居民的“兼职”，往往用于家庭内部，很少对外销售，而租棚种菜的农户则更倾向于将生产的蔬菜对外售卖。惠民企业搭建的大棚并非全部自己种菜，也会引进外地人租棚种菜，例如新村有贵州、福州的老板租棚种西瓜等蔬果；也有本地村民租赁大棚，例如坊村的农户租棚种花卉，盛村的农户租棚种茄子、辣椒等农作物。租棚农户与惠民企业之间的联结点并不是大棚，而是大棚里蔬菜的病毒。

“进入冬季了，丝瓜没人吃了，霜霉就霜霉吧……霜霉也和癌症一样整片整片地下，好多是绝症，疫病也是绝症，蚜虫传播，还有一个是种子带毒，自身带毒上一代带下来的毒，像人一样，上一代有病生下来的小孩子也带病毒，还有土传病害，还有细菌性病毒……”(新村村民 10191641)

霜霉病常常出现在黄瓜、辣椒、番茄等蔬菜中，也是基地经常种植的作物。石镇水源充足、气候湿润，下半年长时间降水导致空气湿度增大，植物的根、茎、叶有着不同程度的感染，尽管露天种植也会出现类似的疾病，但大棚内温度高、湿度大、空气不流通，通常整棚整棚地暴发病害。植物的疾病会导致额外的支出，如果预计的收入小于投入的成本，租棚的小农往往会选择放弃耕作，但病毒并非短期存在于大棚之中，而是经常面对的困扰。这意味着租棚的农户经常要选择是放弃投入更多的技术成本，还是用棚“赌博”：

“我以为(他们的农药)是很有用的，他们估计也是实验，我也是在这里赌啊，用自己棚赌啊……(惠民两个负责人)都是外行没有内行，你说他不会(做农业)吧又会，说会吧又不会，就是这样，跟我一样在起跑线上”(盛村村民 10221324)

事实上，租棚农户们对规模化农业生产有着强烈的反思，他们面对的不是农业经验不足，而是农业经验的因地制宜。最开始他们也相信国外进口或媒体大力宣传的农药、又或者是高校下来做实验的博士生，但是在农业问题上，同一种病毒在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植物、植物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表现。因此，农业技术的嵌入一方面让他们与更大的市场接轨——经历着生产方式的社会化(王庆明，2015)；另一方面则是反思大棚蔬菜的发展。这一层面上，他们成为农业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

4.2 大棚雇工：标准化生产与家庭隔离

惠民企业密切联系的第二类农户则是在棚内务工的村民，他们往往是因为土地流转后没有活干，去找村委会协调或者直接找王华进入到大棚里工作。基地的大多数工人都是女性，一是村里男性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妇女，在家务活动之外还有多余

的时间；二是工种也相对简单轻松，而女工的工资相对较低。大棚里做工往往是标准化的，例如种苗前需要将确定苗与苗之间有着同样的距离，之后也需要根据苗的种植数量确定产量的多寡。苗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凭空得到的，而是根据大数据测算出来，这与普通露天种植“随意”撒一把种子完全不同。棚里工人做工的熟练和好坏取决于是否符合种植方式的要求，如果不按特定的方式种植，可能会结出“歪瓜劣枣”或者产量不佳。

“她没有概念，后来我也没办法我就凶他们一顿说，你不会你就拉绳子，拉了绳子就很直，不拉绳子又歪了……今天分错了，她做这个是很不适合，哪有这么慢呢……(规模化)农业主要开支是在于人工。假如是包给他们，她不会按你的技术来，不一定搞得不好”(WH10180849)

事实上，雇工群体是对技术无反思也无需反思的群体，因为他们不用为产业整体负责，更多的是需要对这种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的适应。大棚工人相对于公司的工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但相比于种植自家土地的农户又多了集体劳动的部分，集体劳动要求互相协调。工人接受的技术不会对实际生活产生效用，所以大多数来大棚务工的农户需要较长的时间适应这种生产环境。换言之，她们并非接受了公司的整体，而是这种福特主义式的流水线工作嵌入到她们的生活之中，但原来的生活没有被完全取代。

“他们都是要现金，我要去银行取，收钱，数的手都(累)，老百姓要数钱收钱的感觉，这个年纪要看到钱，踏实……有的是这样和我说的，我不想让家里知道我有多少钱”(WH10171932)

在大棚务工的居民往往要求用现金结账：一方面是因为现钱相比于银行卡更有安全感，另一方面到自己手上就是自己的钱，不会和其他人发生关联，这里便出现了个体反思与家庭隔离的力量。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嵌入性视角下探讨了下乡企业扎根村庄的同时，村庄内租棚小农与雇工农户对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反思。“嵌入性”思想起源于波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语境下，前现代社会中的人类行动并不与占有物品的经济利益相联结，而是与其社会地位、权力相联结，由此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属于社会结构；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进一步认为，经济行动上嵌入于社会关系网之中，“关系嵌入”进一步维持着经济制度；而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则强调经济行动有着道德嵌入性，意指经济活动背后内含一套历史文化逻辑；全球化下，经济行动在地理空间意义上无法脱离于地域性特点，“嵌入”内在包含着空间属性。无论是关系、文化还是空间嵌入，经济活动无疑是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之下不断运作的过程，也同样包含着制度中的行动与反思。

企业的程序合法到实质合法需要持续不断的关系嵌入，土地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相互冲突制约着企业的空间嵌入，关系和空间两者的张力使得资本下乡在文化意义上脱嵌。租棚农户完成了技术嵌入的生产社会化，构成了农业生产知识结构中的反思性力量；大棚雇工则是在习得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中调整原有的生活，重新建构对家庭生活的认知。藉由下乡企业，农户更加紧密地融入村庄和家庭的社会变迁之中。

参考文献：

[1]陈航英.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基于组织化的小农户与具有社会基础的现代农业[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2):10-19+155.

[2]陈航英.扎根乡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社会基础[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05):25-31.

-
- [3]陈航英.干涸的机井:资本下乡与水资源攫取——以宁夏南部黄高县蔬菜产业为例[J].开放时代,2019(03):150-168+8.
- [4]陈义媛.资本下乡:农业中的隐蔽雇佣关系与资本积累[J].开放时代,2016(05):92-112+8.
- [5]陈义媛.中国农资市场变迁与农业资本化的隐性路径[J].开放时代,2018(03):95-111+9-10.
- [6]陈义媛.资本下乡的社会困境与化解策略——资本对村庄社会资源的动员[J].中国农村经济,2019(08):128-144.
- [7]陈锡文.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几个主要问题[J].改革,2012(10):5-8.
- [8]卡尔·波兰尼(匈牙利).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9]吴重庆,张慧鹏.小农与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产业分工体系中小农户的结构性困境与出路[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1):13-24+163.
- [10]贺雪峰.论中坚农民[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04):1-6+131.
- [11]贺雪峰,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6(02):45-65.
- [12]张慧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J].小康,2019(35):6.
- [13]焦长权,周飞舟.“资本下乡”与村庄的再造[J].中国社会科学,2016(01):100-116+205-206.
- [14]A·恰亚诺夫(俄).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
- [15]王庆明.西方经典小农理论范式的反思与重构——立足于转型中国的思考[J].社会学评论,2015,3(02):56-64.
- [16]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6,31(05):63-87+243.
- [17]徐宗阳.资本下乡的农业经营实践——一个公司型农场内部的关系与风气[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06):49-60+157-158.
- [18]周飞舟,王绍琛.农民上楼与资本下乡:城镇化的社会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01):66-83+203.
- [19]周飞舟,吴柳财,左雯敏,等.从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社会学考察[J].社会发展研究,2018,5(01):42-64+243.
- [20]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05):48-57.
- [21]Granovetter,Mark.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03):481-510.

[22]Zelizer,Vivianna. “Human Values and the Market:The Case of Life Insurance and Death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84(03):591-610.